



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

哥伦比亚大学维尔（Vale）可持续国际投资中心

FDI 热门问题的观点

系列 70 2012 年 5 月 28 日

主编：Karl P. Sauvant (Karl.Sauvant@law.columbia.edu)

执行编辑：Jennifer Reimer (jreimer01@gmail.com)

FDI，追赶性增长的阶段与阶段聚焦战略

Terutomo Ozawa*

本文回应了 Francisco Sercovich 对笔者先前的“**展望**”中关于 FDI 引领工业起飞的观点的评论¹；在先前的“**展望**”中，笔者把国际直接投资（FDI）描述为追赶式工业化²的“点火器”。而 Francisco Sercovich 在文中则强调了“丰富而差别细微的各种战略选择”³（比如，科学和技术（S&T）（能力建设）政策，工程学教育，（建立韩国）**财团式**企业吸收技术，研发（R&D）能力），但是，这些仅与追赶（catch-up）的**较高**阶段紧密相关，而与笔者在先前的“**展望**”中所聚焦的“**起飞**”阶段并**无**关联。增长的不同阶段的结构变化所产生的经济发展，需要与该阶段相适应的聚焦战略。

* Terutomo Ozawa (T.Ozawa@Colostate.EDU) 是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经济学名誉退休教授，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日本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作者感谢 Raphael Kaplinsky, Rajah Rasiah 和 Dennis Tachiki 对文章早期版本的有益建议。**作者文中表达的观点并不代表哥伦比亚大学或其合作伙伴以及支持者的观点。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 (ISSN 2158-35790) 是同行评议刊物。**

¹ Francisco Sercovich, “知识，对外直接投资和赶超战略”，*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系列 53（2011 年 12 月 19 日）。

² Terutomo Ozawa, “工业化初期跨国公司的作用：从‘幼稚产业保护’到‘FDI 引领工业起飞’”，*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系列 39（2011 年 6 月 6 日）。

³ 引自 Sercovich 所撰写的系列 53 中的第一段。

FDI 引领起飞适用于追赶 (catch-up) 的**初始**阶段；在初始阶段中，劳动力丰富的新兴经济体在低端制造业具有与生俱来的比较优势。而较高阶段明显地越来越多地建立在知识之上，而且要求更为复杂的实现途径。如笔者先前所述，“由于已经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中国现在将不得不调整和完善其发展战略……”⁴，而每一阶段都需要不同的预备措施，制度体系和战略⁵（与之适应）。

而且，幼稚工业保护 (IIP) 的理念已开始被夸大而几乎掩盖了（其余）各种发展途径。不同于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 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提出的**传统**IIP 理论——其强调了进口替代以保护与促进**本国**产业——而**不是**像通常的发展政策，允许外国进入本国产业；FDI 引领模式已被概念化。

在这方面，日本战后在资本密集型产业（比如，钢铁，机械，汽车）的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引入和改进西方技术，有效地实施了汉密尔顿-李斯特 IIP 战略。但是，受战争严重毁坏的日本**最初**是从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开始，并随之快速重建恢复了出口产品（如玩具，纺织品）。事实上，日本并不亟需发展轻工业（以支持现代化进程）——但却因此而**避免**了外国跨国公司 (MNEs) 的投资进入。

与之相反，在 1960-1970 年代，新加坡，中国台湾省以及韩国刻意设立了出口加工区域以吸引劳动寻求型 FDI，因为他们缺乏生产出口制成品的经验。而且，他们在吸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方面快速取得成功，这是工业现代化的**第一步**。中国也仿效了邻居的成功经验，于 1978 年开放了贸易和 FDI。中国的经济特区和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外国跨国公司 (MNEs) 进入并建立起了中国低成本、出口拉动的制造业，很快地缓和了贫困情况。

FDI 引领的起飞从而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化助推器，以及更为**方便**的内向型 IIP 战略之一。工业现代化的这样一个开端**并不要求** Sercovich 所**引用的**复杂的方法。事实上，这也正是为什么世界银行正催促中国将其低薪工厂迁往非洲以鼓舞当地工业化进程的原因；虽然非洲（除南非外）**仍然**缺乏（实施）差别细微的战略的

⁴ 引自 Ozawa 撰写的系列 39 中的第九段。

⁵ 一个政策框架，参见 Terutomo Ozawa 提出的“主导部门增长”模式，原文载于“The (Japan-born) ‘flying-gees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sited -- and reformulated from a structuralist perspective,” *Global Policy*, vol. 2 (October 2011), pp. 272-285.

能力（比如，科学和技术（S&T）的能力，（韩国）**财团**式的技术能力，以及可与外国跨国公司（MNEs）竞争的研发（R&D）能力）。

当韩国开始从建于 1970 年的马山市（MASAN，韩国港口城市）出口加工区域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如假发，玩具，鞋类）时，事实上，他们并不需要将**财团型**企业作为战略选择之一。仅在**随后的**追赶（catch-up）的**较高阶段**（即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工业化以及装配工业的发展），**财团**才变成一个强大的工具——正如日本战后**企业集团（keiretsu）**一样——以建立规模驱动型，资本密集型工业（比如，造船，机械，微芯片，汽车）。确实，政府早在 1960 年代末就已开始聪敏地致力于利用贸易保护与补贴政策确立这些（属于工业化）较高阶段的工业（比如，1969 年颁布的《电子工业促进法》最初是为了鼓励黑白电视的**组装**产业，即从基于知识的工业的**末端**开始）。但是，所有这些工业都**仅在最近数十年来**才开始具备国际竞争力。有趣的是，在信息科技引领创业和创业企业的时代下，**财团**或许甚至目前已被认为是过时了。

因而，阶段式观点（即对追赶（catch-up）进行分阶段考虑）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例如，**当前的情况下**，要求非洲未工业化国家组建**财团型**企业并投资建立科学与科技（S&T）的（发展与研发）能力为时过早；反之，非洲应该**首先**应用其**有限的发展资源**（包括与之适应的政策制定能力）吸引 FDI 进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作为 FDI 引领起飞的“点火器”。这是世界银行必须应考虑。确实，也可能有其他选择，比如培育中、小型本土制造企业，寄希望于通过出口引领起飞。一些人甚至提出一种跳跃式的战略，直接进入高端产业。但这种方式，即使可行，风险与发展也不平衡，而且置该区域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而不顾——那么穷困的民众仍将处于失业中。但是，一旦（国家）获得强劲推动开始起飞，也需要更复杂的适合较高阶段的战略支持追赶（catch-up）。总之，**首先**开发利用**与生俱来的**优势，然后尝试“创造”新的优势是合理的。

（南开大学国经所谭人友翻译）

转载请注明：“Terutomo Ozawa, ‘FDI, 追赶性增长的阶段与阶段聚焦战略’”, 《哥伦比亚
亚外商直接投资展望》，2012 年 5 月 28 日第 70 期。转载需经哥伦比亚 Vale 可持续国际投资研

究中心 (www.vcc.columbia.edu) 授权”。[请将副本发送至哥伦比亚 Vale 研究中心 vcc@law.columbia.edu](mailto:vcc@law.columbia.edu)。

如需详细信息，请联系：哥伦比亚 Vale 可持续国际投资研究中心，Jennifer Reimer, jreimer01@gmail.com 或 jreimer@lyhplaw.com。

由 Lisa Sachs 女士领导的哥伦比亚维尔可持续国际投资中心(VCC – www.vcc.columbia.edu)，是由哥伦比亚法学院和地球研究所联合建立的研究机构。它力图成为全球经济环境下的对外直接投资事务的领导者。VCC 致力于分析和传授基于公共政策和国际投资法视角下 FDI 的影响。

最新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文章

- No. 69, Karl P. Sauvant,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 again --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From control, to liberalization to rebalancing,” May 21, 2012.
- No. 68, Sophie Meunier et al., “Economic patriotism: Dealing with Chi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May 14, 2012.
- No. 67, Paul Antony Barbour et al., “The Arab Spring: How soon will foreign investors return?,” May 7, 2012.
- No. 66, Kalman Kalotay, “Does it matter who invests in your country?,” April 30, 2012.
- No. 65, Mark Feldman, “The standing of state-controlled entities under the ICSID Convention: Two key considerations,” April 16, 2012.
- No. 64, Karl P. Sauvant and Jonathan Strauss, “State-controlled entities control nearly US\$ 2 trillion in foreign assets,” April 2, 2012.
- No. 63, Miguel Pérez Ludeña, “Is Chinese FDI pushing Latin America into natural resources?,” March 19, 2012.
- No. 62, Karl P. Sauvant, Chen Zhao and Xiaoying Huo, “The unbalanced dragon: China’s uneven provincial and regional FDI performance,” March 5, 2012.
- No. 61, Clint Peinhardt and Todd Allee, “Different investment treaties, different effects,” February 20, 2012.
- No. 60, Alice Amsden, “National companies or foreign affiliates: Whose contribution to growth is greater?,” February 13, 2012.

所有前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展望详见：<http://www.vcc.columbia.edu/content/fdi-perspectives>